

中 /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39

私塾、科举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22

39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私

塾

王凌皓

王月霄

编著

科

举

李鹏程

李以学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胡维革		
副主 编	陈立忠	胡晓岩	郝国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晶娜	田毅鹏	
	厉永平	李书源	
	陈立忠	陈虹妮	
	周玉和	郝国昆	
	胡晓岩	胡维革	
	赵永春	程舒伟	
	雷 庆	颜震华	
	魏克威		
责任编辑	刘慧杰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今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今天，如何使这一东方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使其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大业服务，是当代国人学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如何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接受中华民族优秀统文化的熏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以肩负起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更是时代赋予的宏伟重托。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这套丛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文化事象立题，共选择100种文化事象，每两种文化事象为一本，共50本。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力求内容科学准确，文字潇洒飘逸，风格新颖别致；既注重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又着眼于现实借鉴和运用；既写清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文化蕴含，又将与此事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文、人物等囊括其中；夹叙夹议，文史交融，妙趣横生。总之，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宣传典雅、崇高、真善美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

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远谈不上包罗净尽、解说确当，更不待说尽其精要、毕发奥旨了。为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以期日后有以改正提高。

编 者

1998年1月1日

私
塾
科
举

◆ ◆

私塾	(1)
一 春秋发轫, 经久不衰	(1)
二 入圣之基, 晓育英才	(10)
三 默默无闻, 倍尝清贫	(14)
四 私塾课本, 色彩纷呈	(19)
五 教法改革, 探索革新	(32)
科举	(49)
一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49)
二 科举制度下的学校	(55)
三 严格的三级考试制度	(60)
四 冷落的制科和武科	(66)
五 森严的条规场纪	(72)
六 触目惊心的科场案	(77)
七 进身仕途的敲门砖	(83)
八 科举制度的消亡	(89)

私塾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 000 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承，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私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塾学教师，而且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教材，摸索出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并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为继承发展祖国文化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以下我们将从私塾产生及演进过程，私塾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私塾教师、私塾课本和私塾教法等几个方面予以系统的介绍。

一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是私学的初级教育阶段。它发轫于春秋时期，盛行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兴于唐、宋、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它在普及教育、传播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1. 私塾的产生与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杂家、农家、小说家皆授徒讲学，为促进百家争鸣局面的到来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如果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是小规模的、不分层次的，我们可以把那时的私学直接称之为私塾。而自汉代始，私学教育则开始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进行教学了。根据现有史料，汉代私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低、中、高三个不同层次：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

“书馆”是汉代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教师称“书师”，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汉代“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自己的家室或借用公共场所坐馆设教，附近学童入馆就学，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至百人或数百人。比如东汉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一种是豪门富户聘请教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的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专设官邸学教授贵胄子弟之前，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家馆”接受启蒙教育的。无论哪种

书馆，教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读、写、算和伦理道德行为的基本训练。这个阶段结束后，学童进入“乡塾”接受一般经书教育。

一般经书教育由“乡塾”来承担。“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授《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巩固前一阶段识字、习字的成果，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汉代有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而成为卓然独立、力压群芳的学者的。比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通《论语》、《孝经》。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东汉官邸学建立之前，皇室子弟也有外出就塾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比如光武帝刘秀少时就曾到长安就师学习《尚书》，“略通大意”。据说刘秀在向许子威学习《尚书》的时候，钱花光了，就与同学“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以上说明，在识字、习字教育完成之后，诵读《论语》、《孝经》、《尚书》等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粗知文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教学方式主要是“诵读”。它是从大量的集中识字到专经研习的过渡阶段。诵读一般经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既巩固了集中识字的成果，又为进行专经研习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在教育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我国古代教育大体上确定了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高层次的专经研习的基本体系。即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层递进的教育体系。

专经研习阶段是私学教育的最高阶段。汉代私人讲学的大

师都是精通一经或数经的大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长教授弟子，吸收了大批生徒于门下。比如西汉董仲舒精通《春秋公羊》学，“下帷讲诵”，弟子众多，创立了“弟子相传”的教学制度；韦贤精通《礼》、《尚书》、《诗经》，“号称邹鲁大儒”……到了东汉，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成了稳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机构一般名之为“精庐”或“精舍”。“精庐”或“精舍”或建在大师的家乡，或选择山水名胜之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供求学者食宿。精舍讲学具有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性质，往往是经师边说边讲边著述。

在汉代私学的这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中，“书馆”是典型的基础教育，即蒙学；“乡塾”是中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阶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精庐”或“精舍”是高等教育，汉代的私塾主要指“书馆”和与其直接相联系的“乡塾”，而不包括“精庐”或“精舍”。汉后各代沿袭此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离乱”的年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连年战争，封建政权频繁更迭，统治者无暇顾及学校教育，官学的发展时兴时废，而私学，尤其是私塾的发展却很盛。事实证明，每当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时期，学术思想往往得到自由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成为包括私塾在内的私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塾蓬勃发展，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延续文化、发展教育的历史重任，不仅涌现出了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

唐代的私塾多建在乡村，一般称为村校。唐代农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乡民多有学习文化的要求，因此村校办得相当普

遍。它不仅对普及一般的文化知识起到积极作用，也为培养专门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唐代村校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生动活泼，而且很多大文豪和地方官吏在治学从政之余积极教诲后生，他们授徒讲学不辍，实开一代尊师重道新风。

宋代私塾相当发达，而且蒙学化的特点最为明显。宋代私塾无论在教材建设，还是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上都日臻完善。宋代私塾正规化、制度化，可谓盛极一时。宋代私塾种类名目繁多，有小学、乡校、冬学、家塾、蒙馆等。

明中叶以后，重科举，轻学校，官学日衰。清代官学更是有名无实，书院也多学做官样文章。因此明清之际士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学校主要是私塾。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读书识字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中举做官被认为是最荣耀的事业，加之国家提倡社学、义学的影响，因而私塾遍布全国城乡，乃至“普及”的程度。明清私塾主要是蒙学，也有兼教儒经，属于“小学”、“大学”一贯制的。明清私塾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正规化、制度化，而且出现了总结历史经验、专讲私塾教育和管理的专著，标志着私塾教育发展到了新水平。明清之际的私塾，按照设立情形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用祠堂庙宇开设的“门馆”、“家塾”，学生交纳一定的学费入学读书；第二种是“私塾”、“族塾”或“义塾”、“义学”，由一族或一村延师设学，本族本村子弟免费入学，《红楼梦》中所讲述的贾家义学就是这种私塾的典型；第三种是由富贵人家聘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和亲友子弟的“坐馆”、“教馆”。私塾按学生程度划分，有的仅是蒙学水平，招收15岁以下儿童就学，多数私塾兼及更高程度，有的私塾教授

经书，帮助学生应举，学生年龄从七八岁到二十几岁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蒙学以私塾为主，另有社学和义学，它们与私塾的区别是：社学和义学多由官办或官办公助为主，以免费招收“孤寒子弟”为标榜。明初社学多为官办，其后民办社学渐多。清初沿袭此制，诏令官办社学，但已是社学尾声了。义学也分官办、民办两类，民办义学由民间捐田捐银维持，不仅《红楼梦》中贾家义学即为此类，清末武训行乞所办的三所义学更是民办义学的典型。

2. 武训行乞兴学与私塾改良

到了近代，私塾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私塾被改造为近代学堂、学校。在传统私塾向近代学堂、学校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谈谈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

鸦片战争，敲响了改革中国旧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警钟，自19世纪中后期，清代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非学不能出人才，非人才无以救亡图存，于是再次掀起了兴学设教之风，捉襟见肘的清王朝困于财力不足，提出一种简易办法，鼓励民间创办“义塾”，“义塾”实际是旧时私塾的一种，仍然是封建性的旧学校。但是，在我国近代学校萌发之时，不少新式的普通学校就是由这类学校改良而成的。而近代学校的创建，离不开清末兴办义塾的运动，更离不开武训以乞丐身份行乞兴学精神的感召。

武训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原名武七，绰号“武豆沫”，山东堂邑人。幼年丧父，家无分文，“从母乞于市”。武训童年时靠乞讨为生，没读过一天书，从14岁到21岁为人扛活，曾在一个姓李的庠生家做工。“庠生”就是封建社会地方官学的学生。李家做假帐欺骗武训，不仅赖去了他三年扛活的血汗钱，

而且反诬他说诈，武训惨遭毒打。自此，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想法，他说：“自恨不识字，誓积货设义学。”

武训从 1859 年起靠行乞兴学，经过 30 多年的苦行募化，积累了上万吊钱（相当于白银两千多两）。这些钱，他分文不留，全部用来创办了三所义学。第一所义学建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名为山东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学，分蒙学和经学两级；同年创办了第二所义学，名为育英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创办了第三所义学，名为御史巷义塾。这三所义学规定，学生无论贫富，皆可免交学费，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三种义学性质相同，都是封建蒙学和经学教育，实际就是不收学费的私塾。据《武训历史调查记》披露，崇贤义塾的第三任塾师滕秀峰，收生徒 33 人，其中 22 人考中秀才，其余皆补取童生出身。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学堂中受学弟子，彬彬济济，擢高第，成通儒，不可胜数”。虽然这一结果与武训当初办学的宗旨相悖逆，但据此，我们却可以看到武训先生的义学办得还是颇为出色的。

武训希望通过创办义学，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使贫寒子弟免受地主恶霸的欺压。本着这个宗旨，他每天节省度日，衣不裹体，饭不饱腹，积劳成疾，于 1896 年 4 月 23 日病死于他亲手缔造的御史巷义塾内，年仅 58 岁。

武训行乞兴学，行善乡里的事迹感人至深，影响巨大。1893 年武训家乡堂邑县的知县将武训请到忠祠内，堂邑和临清等地绅民在崇贤义塾东侧修建了武训专祠，1903 年山东巡抚袁树勋以“义丐武训积资兴学”为由，奏请清廷为武训立传，1910 年学部正式把武训的事迹列入清史，载于《清史稿》。

武训行乞兴学，是中国私塾发展史上的特例，在近代教育

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时时成为激励人们不懈奋斗的特殊力量，受到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赞扬。比如梁启超曾写过《武训传》；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曾撰文《武训先生提倡了我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普及大众教育，在极为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用“武训精神”自励励人。1940年，陶行知先生明确提出要学习武训精神，他认定武训精神的核心是“牺牲自我”。1944年，他进一步揭示了武训精神，他说武训精神：

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概括它。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武训本人没念过书）。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有四个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武训行乞兴学，是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宣告了我国学校教育发展的极其滞后状态。落后的初等教育既不能满足人民最基本的文化教育需求，也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腿。武训的义举震撼了中国政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直接引发和推动了近代私塾改良运动，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只承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间自办，称为私塾。近代兴办普通教育之时，国家无力一切求新，对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为私塾找到了转轨变型的最合适的道路。

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诏令全国对私塾进行改良，强调改良过程中，对私塾“不应歧视”，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

学人数，从发展教育角度讲，“国内多一就学之人，教育即有一分起色”。这种改良私塾的观点和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既有助于儿童就学，也有助于塾师就业。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进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颁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渐期合法，并补助地方教育为宗旨”。此《章程》颁行之后，全国各地渐次对私塾进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对私塾进行登记、调查，摸清改良的难易程度。

其次，对塾师进行劝导，并且发给学部编定的简易课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

再次，各学区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向塾师传授新知识，尤其加强教育学和教授管理法等教师必备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灌输，给教师洗脑。

第四，对塾师开展“甄别”工作，评定其教学的优劣等级，经督学局局长核定后，对最优等、优等、中等水平的塾师张榜表扬，并酌量颁发名誉金，以示鼓励。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并换上私立初等小学堂牌子，规定其毕业生享有与官立小学堂毕业生的同等待遇。

经过这次改良，私塾的发展出现生机，很多私塾变为私立小学，塾师水平亦有一定提高。但限于人力、财力，改革是不彻底的，直到新中国成立，私塾在我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偏僻落后的皖南地区，刚解放时，全区有私塾3768所，相当正规小学总数的二倍以上，塾生4.5327万人，相当小学生人数的1/3，塾师3768人，相当小学教师总数的3/5。私塾的长期存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不前相适应，私塾简易省钱，一师一屋，便于深入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的

地区，满足当地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由于私塾具有这样的特点，又不限定入学年龄、修业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层、润物无声，它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全面普及初等教育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普及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私塾所进行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功德无量、永垂史册的。

二 入圣之基，晓育英才

私塾是旧时私人办理的初等学校，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不负责初等教育。中央官学多为高等教育性质，地方官学如州县学多是在蒙养教育基础上读四书五经和学习诗文，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属于中等或高等教育性质，因此基础教育的任务多由私塾来承担。这样，私塾的教育质量就是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它不仅影响私学中高等教育的水平，也直接决定着官学的起点，因为它们接收私塾的生源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私塾教育，把它称为“蒙养教育”。所谓“蒙养”，即是取“蒙以养正”之意，意思是用正确的教育启迪儿童的智慧和心灵，使儿童健康成长，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古代先哲非常重视蒙养教育的基础作用，《易经》上早就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南宋的朱熹根据古代教育经验和自己多年从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把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阶段是8—15岁，为打基础的阶段，他把小学阶段比喻成“打坯模”，他说小学阶段打好做圣贤的坯模，至关重要，只有基础打好，以后孩子上了大学，在此基础上加

工，增长些知识，就可以成为圣贤了，即所谓已有了“圣贤坯模”，大学“只就上面加光饰”。否则若坯模打坏了，就难以弥补了，他说“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因此，他主张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注重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也十分重视蒙养教育。他说：“蒙者，知之始”，“正之唯其始”，“养其习与童蒙”。强调从小给儿童正确合理的教育，否则教育不当，儿童恶习已成，要“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可胜”。在他看来，儿童既有造就成“英才”的条件，也有成为“败家子”的可能，所以无论是家庭还是私塾，都必须对其严格要求，认真训导。王守仁不仅重视蒙养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在长期从事蒙养教育的实践中，探索教育规律，提出了一套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体系，对后世极有指导意义。

由于古人重视私塾教育，把它作为“入圣之基”，因而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积极从事私塾的教育教学工作，带动了私塾教学水平的提高，使得私塾人才辈出。

翻开中国历史，阅看名人传记，许多名人都接受过塾师的严格指导和训化。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书文奇伟”的鸿师硕儒王充8岁入私馆学习《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书日进，又无过失”，是私馆里的优等生。由于王充在私馆中成绩优异、品德高尚，“乡里称孝”，被保举到中央太学。在太学学习期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家之言”。太学毕业后，王充重返故里，著《论衡》20余万字。

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孔颖达8岁入私塾，诵记日千余